高明士教授八秩嵩壽文集補編

摯友・師生情誼

嚴茹蕙編

目 次

謝辭代序 1

頌壽詩、孔子像與漢字詩 5

黃源盛教授頌壽詩 7

孔子木雕像（七十歲祝壽禮物） 9

宋德熹教授「學・漢字詩」 10

八秩感言 ..... 高明士 13

摯友情誼重.....15

「唐律讀書會」對於法學者研究法史之意義 ..... 陳惠馨 17

高明士先生賀壽會發言稿..... 黃正建 29

高明士教授對海外漢學的譯介..... 趙　晶 33

弟子問學記.....41

廟學制的啟示與唐太宗帝王學的反思——高門問學小記.. 宋德熹 43

「天聖令學」的催生者：高明士先生 ..... 陳登武 51

對話平台 育才基地：話說唐律研讀會 ..... 陳俊強 65

高門問學雜感 ..... 賴亮郡 79

法制史研究和接觸日本學術界的導師 ..... 劉馨珺 89

是一種福分，高門從學記 ..... 劉燕儷 91

「唐律研讀會」之旅： 札記一個不同凡響的讀書會 ..... 邱澎生 93

高山仰止 ..... 黃玫茵 97
不斷粹煉與群學砥礪的學習歷程 ..... 張文昌 101
謹致恩師：隋唐史與東亞古代史的學術長青樹 ..... 古怡青 111
成長與感謝：參與「唐律研讀會」的回想和收穫 ..... 李如鈞 119
感謝與敬意：與高明士老師的學術緣分小記 ..... 嚴茹蕙 123
附錄：2020 年 7 月 18 日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 129

高明士教授對海外漢學的譯介

趙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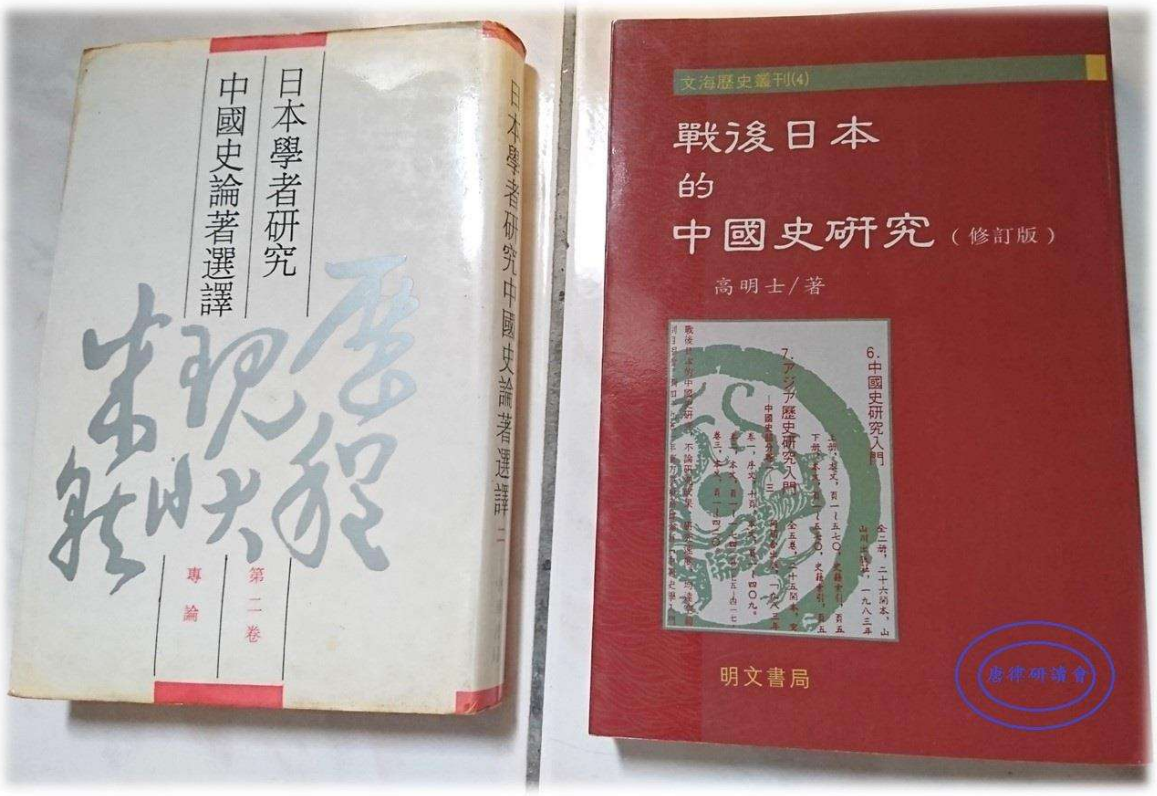
按：2020 年 7 月 18 日，我有幸通過視頻方式參加高明士先生賀壽會，分享了一些閱讀心得。7 月 20 日，我用微信公號「源和柳莊」推送了黃正建先生的發言底稿，陳登武教授遂鼓勵我公佈自己的發言稿。因賀壽會當日我只製作了 PPT，所以現在只能根據每頁 PPT，追憶出一些即時發言的內容，再賀高先生嵩壽。（初記於 7 月 21 日）

感謝陳登武教授給予這個寶貴的機會，可以讓我向高明士先生致敬。其實，關於高先生的道德學問，在座的許多教授都是切近問學的門生、弟子，比我更有發言權，而且從今日的海報來看，之後也會有教授專門予以闡發。所以我選擇了高先生對海外漢學譯介這一主題，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談一談高先生在學術貢獻上的一個側面。相對於組織讀書班，譯介海外漢學的受益者群體更大，這是高先生以一己之力、惠澤後學的壯舉。

高先生對海外漢學的譯介，首推這本專著《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此書初版於 1982 年，2019 年又發行了簡體字本，風行三十餘年。我又覆查了一下所收各篇的出版資訊，最早的一篇出版於 1976 年，迄今已四十餘年。在當時海外學術資訊搜集不易、圖書館購買外文資料有限的情況下，這種譯介

*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工作所發揮的開拓國際視野的功效，恐怕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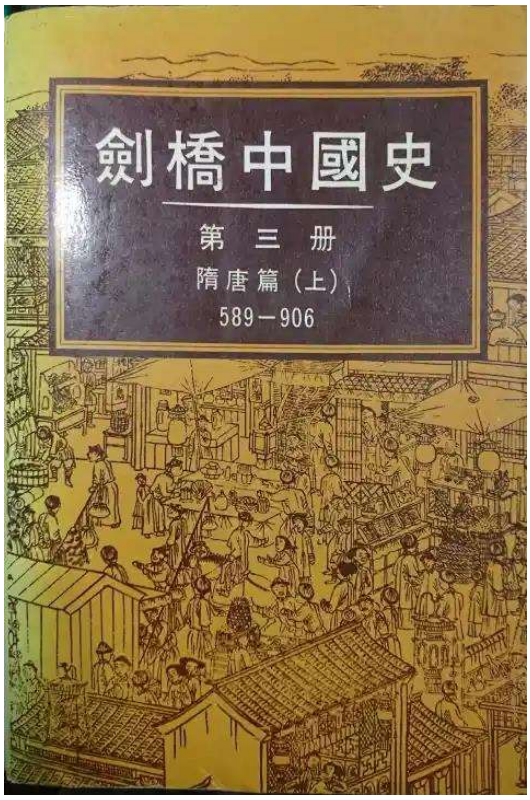


圖左：《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 圖右：《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該書採用撰、譯並舉的體例，收錄了兩篇譯文[補：谷川道雄《中國史時代區分問題》；池田溫、岡野誠《敦煌、吐魯番所發現有關唐代法制文獻》]。全書歸納了日本戰後中國史研究的三大課題[補：批判并克服「亞洲社會停滯論」；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尤其是東亞史或亞洲史研究；以民眾作為歷史變遷的主角]、八個專題[補：時代區分論戰、中國近代化問題、國家成立論、東亞世界論、關於土地稅役等制度史的研究、良賤制研究、鄉紳論、歷代諸叛亂性質的研究]。高先生曾經跟我說起，他在日本留學時曾列出十個專題，廣泛搜集日文資料，準備逐一撰文介紹，奈何回台之後繫於教學，分身乏術，未能在手頭資料的「保鮮期」內寫出文章，隨著日本國內相關研究的更新，他難以繼續追蹤前沿，只好放棄。這當然是很遺憾的事情。從該書來看，「時

代區分論戰」佔據了主要篇幅，是高先生最為用力之處。除專題研究外，高先生還陸續介紹了史料、日本新出的入門概述書[補：《中國史研究入門》、《アジア歷史研究入門》]、日本的唐代史研究會。其中，在史料部分，又分為兩大類，一種是以史料為核心，概述當時日本的研究史[補：秦簡與敦煌文獻]；另一種是對日本新刊的史料影印本或譯注整理本，做解題式介紹[補：《唐六典》、《開元禮》、《翰苑》、《福惠全書》、《譯註日本律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高先生的介紹並不僅限於「照著講」，而是有所互動、回應。如就《開元禮》而言，高先生還特意調查了臺北所藏的版本，尤其是介紹了朱紹頤所撰《開元禮校勘記》，為我們進一步比對相關版本提供了重要線索。

高先生是留日出身，但並未將目光局限於日本。如劍橋中國史系列的隋唐篇上卷，就是由高先生做總校訂，率先推出漢譯本的（1987 年）。



《劍橋中國史·隋唐篇》上卷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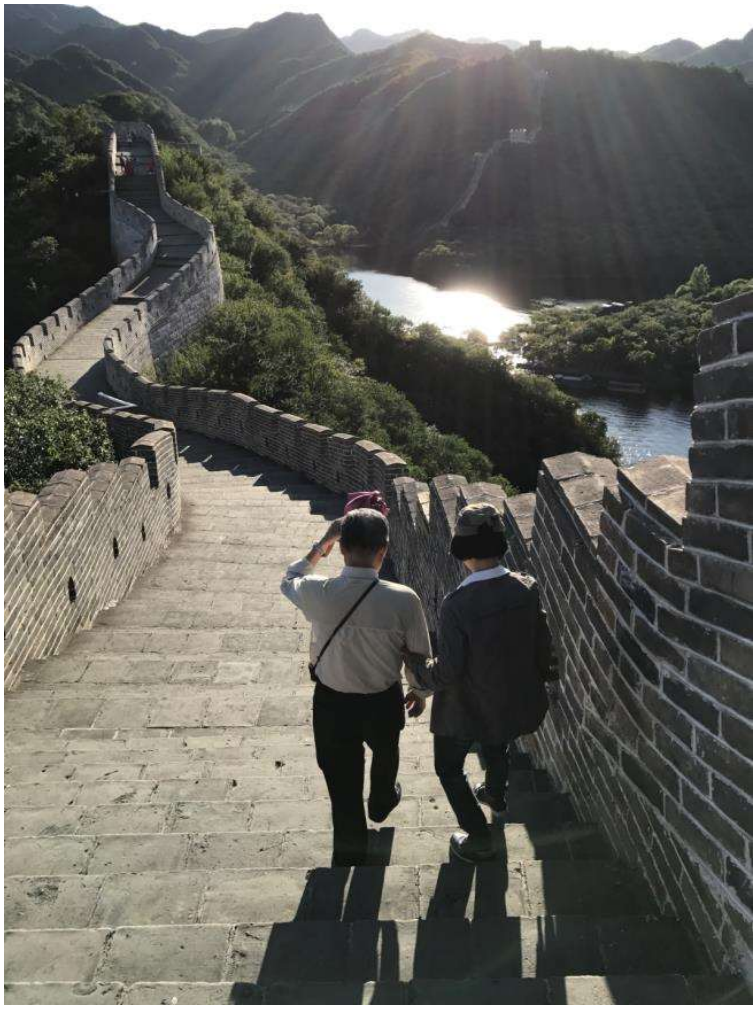
此書的英文原版於 1979 年出版，大陸的簡體字本出版於 1990 年，可見當時

臺灣學界對於海外漢學譯介的領先程度。[補：記得高先生在回憶傅樂成先生的文章裏講到，此書所得稿費 1 萬元，皆給傅先生充作醫療費，弟子侍師的孝義情分也令人動容。（原本想藉此點回應黃正建先生發言中的「尊師」說，但因為趕 10 分鐘的發言程限，臨時忘記了。特此補出，時為 7 月 21 日）]

在《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高先生已述及山根幸夫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這是日本中國史學界推出的頗具代表性的入門概述書。日文原版出版於 1983 年，高先生的介紹文發表於 1985 年，而到了 1990 年，該書的漢譯本就由聯經出版公司推出，主事者依然是高先生。在場的黃正建先生是大陸簡體版的譯者之一，簡體版晚出了 4 年。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高先生的這套《指南》，不僅有譯文，而且還組織了港臺學者，綜述 1950-1985 年間港臺地區的相關研究，對日本研究進行回應，彰顯了華人學界的成就，難能可貴。延續這一思路，高先生又在 2004 年主編出版了《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八冊，有階段總結的意義。

高先生除了翻譯谷川先生的《中國史時代區分問題》外，還參與了劉俊文先生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翻譯了數篇西嶋定生先生的論文。這冊「專論」卷，就有高先生、邱添生先生等臺北學者的貢獻。此套叢書出版於 1996 年，除高先生等外，如第一卷的「通論」，就是由香港學者黃約瑟先生獨力譯出，可謂是兩岸三地通力合作的結晶。當時兩岸解凍未久，高先生已深度參與大陸的學術出版活動，在當前的局勢下，讓人頗有今夕何夕之感。

總而言之，高先生對海外漢學的譯介，不僅追求時效性，而且注重本土的回應與互動。作為學者，屬於「教、撰、譯、編、審」五項全能的高手。2017 年 9 月我曾邀請高先生來京交流，下邊的照片是他於 22 日登上黃花城水長城的留影。高先生以 77 歲高齡，全程走完這段長城，身體之健朗，由此可見一斑。我們說「不到長城非好漢」，所以高先生是好漢，還是「五技並擅」的好漢。謹此再祝高先生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謝謝各位。



2017 年 9 月 22 日高明士先生與師母登上黃花城水長城

【附錄】

2020 年 9 月 4 日，我接到嚴茹蕙博士來函，告知高先生有意集結賀壽會發言以為紀念之事，於是就想在修訂、增補以上的按語和發言內容之外，再續寫一些問學往事，作為附錄。

2019 年 12 月 17 日，劉馨珺教授曾建議我在小文<唐代律令關係再探究——以《唐律疏議》所引唐令為中心>之後追加「後記」，回顧自己向高先生請益的緣起、經過。我即於當日撰寫了「附記」，簡述十年來高先生對我的

教誨與提攜（參見陳俊強主編《中國歷史文化新論——高明士教授八秩嵩壽文集》，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頁 233-234）。當時限於體例，述之甚簡，而今擬以兩件親歷之事，從另一側面展現高先生的言傳身教。

這是我保留的與高先生最早的合影。時為 2015 年 12 月 11 日，尤陳俊兄來台參會，我則在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客座副教授，高先生招待尤兄，囑我作陪。「春天素食」是高先生最喜歡的宴客之處。

2011 年 8 月 24 日，高先生來信，告知他將於近日去新竹清華大學演講（即「東亞的書院與科舉」國際學術會議的主題演講），介紹朝鮮李朝謁聖試，因宮崎市定先生〈宣祖時代の科挙恩栄宴図について〉所收「李朝宣祖十三年（1579）謁聖試恩榮宴圖」圖版較為模糊，所以希望我能幫忙去日本京都的陽明文庫拍攝原圖。我因不知相關申請事宜，遂向辻正博先生請教。辻先生於 26 日下午在研究室向我展示了《近衛家 陽明文庫の名寶——王朝文化

の創造と伝承》（MOA 美術館發行，1998 年），該圖錄收有「榮宴圖」的高清彩色照片，效果頗佳。當即就煩請辻先生親自掃描，然後由我送呈高先生。七年之後的 2018 年 12 月 13 日，高先生來信，言及正在整理這一演講稿（發表時名為〈謁聖禮、謁聖試與下馬碑——東亞科舉與聖域的另一章〉），擬交由厦門大學劉海峰先生主辦的《科舉學論叢》發表（即 2019 年第 1 輯，後收入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續編——禮教與法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20 年），因需在文中標記圖版來源以示感謝，所以再度向我確認當年之事。坦率而言，此事若非高先生提起，我已完全忘記了，在檢讀當年往返郵件之後，方才想起各種情景。由此可知：第一，高先生的記憶力極好，令晚輩如我慚愧無地；第二，對於他人的點滴幫助，高先生都銘記於心，但有機會，就宣諸文字（如「畏友辻正博教授提供，於此特申謝忱，惟文責仍在筆者」），這是對「禮」的執著，令人欽佩。此即第一件事。

2013 年 5 月 17、22 日，因討論唐代律令，高先生在郵件中提出對敦煌《永徽職員令》殘卷定名為「東宮諸（府職員）」的懷疑，認為應釋為「東宮王（府職員）」。我在覆查英藏圖版後，於 23 日回信表示對「王」字釋讀的猶疑。高先生於 31 日回覆：「吾兄之『持疑』，對我是好事，可讓我多作思考，將來希望能說服讀者。」7 月 6 日，高先生來函稱：「關於《永徽職員令》殘卷還在整理……這個問題，直接衝上我的恩師池田溫及畏友岡野誠兩位先生，若無六七分把握，仍要放棄。」同月 24 日，高先生擲下〈唐「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名稱商榷〉底稿（後發表於《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7 輯，又收入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並在郵件中謙稱：「由於絕對證據尚未出現，因此拙稿無意否定既有的學說，只是想提出另一可能的意見，以供學界參考。」在我對唐令的兩大系統劃分提出疑問後，高先生又於 8 月 1 日回函：「因為是推論，所以論證較為薄弱，是可承認，但因為無更直接證據，用推論大膽提出，不失是一種討論方法，聊備一說而已。其實拙稿在沒寄吾兄之前，我已先寄給岡野誠教授，請他表示意見。（由於恩師池田溫先生年事已高，不敢打擾他。）……

希望拙稿能對學界作善意表達。蓋真理只有越討論，才越真實。」之所以此處一再徵引郵件原文，是想藉此呈現高先生言行中體現出來的難能可貴的品格：第一，對學術的敬畏，即使是晚輩提出的疑問，高先生亦採取極為謙退的姿態；第二，對師友的尊重，學術商榷該如何採用「善意表達」，同樣也屬於「禮」的範疇。此為第二件事。

由上述兩件小事可知，高先生待人以「禮」、為學有「法」，且以身作則，以君子之範「教育」後學。無論是「禮」、「法」，還是「教育」，皆是高先生畢生研究的心血凝聚處，可謂「學以致用」、「學修合一」。

補寫於 2020 年 9 月 19 日